

# 恩格斯的自然观离开“实践”了吗? ——基于恩格斯晚年经典文本的再考察

王洪波，程宇林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恩格斯的自然观是否离开“实践”始终是学界论争的重要议题。依据恩格斯晚年的经典文本，确认人的实践活动是恩格斯自然观的逻辑基点，具体表现为：从实践出发揭示“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变，阐明实践、“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三者间的逻辑关联；从实践出发理解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以实践为基石的人与自然统一的辩证观点；从实践出发揭示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夯实自然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从实践出发阐释人从“自然猿”到“社会人”的转化，科学解释劳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可知，恩格斯的自然观依旧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不仅在原则上与马克思保持一致，而且在内容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关键词：**恩格斯；实践；自然观；生产；劳动

中图分类号：A811; 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5)06-0067-10

自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发起对恩格斯自然观的责难以来，西方学界对恩格斯自然观的争论从未间断。总体上，他们指认恩格斯的自然观“背离了马克思的‘实践的人化自然观’”<sup>[1](118)</sup>。他们的主要依据在于恩格斯所构建的自然认识中“缺少青年马克思的独创性观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性’”<sup>[2](250)</sup>，即缺少人的实践立场。这些观点一经出现便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国内学界从自然辩证法、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回应，其理论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和把握恩格斯自然观中的实践本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也要注意，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总体性研究较为缺乏。基于此，本文尝试以恩格斯晚年的经典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自然观中的实践本体论意蕴，以此求教学界。

## 一、从实践出发揭示“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变

对恩格斯自然观的讨论离不开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不同于黑格尔神秘化自然界，他认为，“自然界是形体的、物质的、感性的”<sup>[3](659)</sup>，同时，“它的存在并不靠人的存在来支持，更不用说以人的理智和心情为基础”<sup>[3](443)</sup>。在费尔巴哈看来，自然界是以物质的方式存在并能为人所感知的，而人以及人的意识皆来自自然界。因此，费尔巴哈要求脱下德国思辨哲学给人(包括人的意识)与自然的关系穿上的“神秘主义外衣”，从自然界的客观性和先在性出发理解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费尔巴哈对自然的理解深刻影响了当时德国的青年进步分子，其中包括恩格斯。在《谢林和启示》中，恩格斯曾指

收稿日期：2025-04-15；修回日期：2025-09-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美好生活理念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23AKS011)

作者简介：王洪波，男，内蒙古赤峰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文化观，联系邮箱：whb7663@126.com；程宇林，男，四川南充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文化观

出费尔巴哈的自然观让我们“从沉睡中醒来，压在我们胸口的梦魇消失了”<sup>[4](391)</sup>，曾经那个“像幽灵一样以其隐蔽的力量使我们惊恐不已的自然界，——现在同我们多么亲密、多么接近”<sup>[4](391)</sup>。恩格斯晚年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也曾表示，在黑格尔主义哲学的长期统治下，费尔巴哈关于自然的见解“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sup>[5](275)</sup>。当时，恩格斯几乎是全盘肯定了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但很快，这种“全盘肯定”就转变成“有力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恩格斯便与马克思一道批判了费尔巴哈对自然界的直观理解，初步阐释了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视域中的自然界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sup>[6](530)</sup>或“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sup>[6](549)</sup>自然界，即“自在自然”，而现实感性的自然界事实上是人化的自然界。所谓“人化”，就在于它是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sup>[6](528)</sup>，而非“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sup>[6](528)</sup>。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只是用抽象物质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乃至整个属人的自然界，没有看到感性的人的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自然界从“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过渡。

晚年的恩格斯依然坚持实践的立场。在《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等文本中，恩格斯进一步捍卫了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

其一，恩格斯延续了《形态》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批判，阐明自然界是人的实践活动对象性存在的现实自然界。恩格斯指出，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sup>[5](294)</sup>，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sup>[5](294)</sup>。恩格斯认为，“确定的东西”就是唯物史观所要强调的。具体到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唯物史观想要强调的就是：现实的人是“历史中行动的人”<sup>[5](294)</sup>，现实的自然界是“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sup>[5](290)</sup>。可见，恩格斯视域中的自然界始终是与人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自然界，而不是费尔巴哈式的对自然界的直观理解。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施密特却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批判恩格斯晚年的自然观背离了马克思的实践立场，是“素朴的实在论”<sup>[7](50-51)</sup>。施密特的主要依据是恩格斯原话，即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份”<sup>[7](50)</sup>。这句话原本被恩格斯从《费尔巴哈论》里删掉，但也能在《自然辩证法》中找到类似表达，即“唯物主义自然观只是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质朴地理解自然界，不添加任何外来的成份”<sup>[9](458)</sup>。事实上，“施密特没有注意到，恩格斯本人的‘自然界’并不是‘素朴实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界，而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方面”<sup>[9]</sup>。在恩格斯的语境中，“素朴实在论”或“质朴地理解自然界”不过是旧唯物主义的特征。恩格斯指出，这种理解自然的方式在“希腊哲学家中间原本是不言而喻的”<sup>[8](458)</sup>，然而，在古希腊和我们之间，存在两千多年的唯心主义却放弃了旧唯物主义的立场。因此，必须对唯心主义的自然观展开批判。当然，这种批判“决不是要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sup>[8](458)</sup>，而是要辩证地吸收“唯心主义的形式内获得的成果”<sup>[8](458)</sup>，并将这些成果从唯心主义的形式中剥离出来。结合晚年恩格斯的文本，我们发现，恩格斯提到的“唯心主义形式内获得的成果”主要是指对人主观能动性的肯定，而剥离唯心主义的形式就是将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肯定转换为对人的实践活动的肯定。可见，恩格斯视域中的自然界仍然是以人的实践活动对象性存在的现实自然界，施密特所谓的“素朴的实在论”不过是对恩格斯自然观的一种误读。

其二，恩格斯认为，通过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sup>[5](279)</sup>。在这里，恩格斯“用‘自在之物’(‘自在的’自然界)特指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改造的自然界，用‘为我之物’(‘自为的’自然界)特指已为人们认识和把握的自然界”<sup>[1](119)</sup>。恩格斯认为，“自在之物”借由实践融入社会发展过程中，变为“为我之物”。在恩格斯看来，实践意味着“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sup>[5](279)</sup>，这个过程事实上就是“把‘自在之物’

变为‘为我之物’的过程”<sup>[10]</sup>。恩格斯将“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统一起来的做法与黑格尔是一致的。黑格尔认为,任何存在物都是关系的存在,即任何存在物都不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实体,而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才实现其本质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自然界既是‘自在的’,又是‘为他的’。”<sup>[11](25)</sup>不过,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在恩格斯的视域中“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是借由实践活动而联系起来的。同时,恩格斯还指出,随着科学技术融入人类的实践活动,“自在之物”越来越多地被打上属人的烙印,成为“为我之物”。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原理与人类实践活动的结合由过去的例外变成通则,科学技术在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中的占比不断升高。在这样的趋势下,“自然界无穷无尽的领域全都被科学征服,不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sup>[8](462)</sup>。这些领域包括动植物栖息地的面貌、气候等,也包括动植物本身。可见,在恩格斯看来,物质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是经由实践活动作用之后的“人化自然”。

其三,恩格斯认为,尽管自然界先天地为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但“这些生活资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sup>[8](548)</sup>。简单地说,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必须和人类劳动结合在一起才能制造出生活资料。进一步说,恩格斯认为不能仅从客体本身的意义上去理解自然界,而是要从人的主体方面出发,将其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感性对象去理解。这是因为,“虽然一般自然先于人而存在,但人的实践活动却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成为我们这个感性世界的前提”<sup>[12]</sup>。因此,一旦缺少实践活动的参与,自然界的先在性与独立性对人类来说将毫无意义。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所言,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sup>[6](193)</sup>,即人类实践活动历史中产生的自然界,否则,它们“对人来说也是无”<sup>[6](220)</sup>。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本身的一切规定性都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被确认的”<sup>[13]</sup>,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变得有意义的。

诚然,在《自然辩证法》等文本中,恩格斯阐释了“自在自然”的两大特性——先在性与独立性<sup>①</sup>,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人的实践立场。在恩格斯看来,承认前者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论证实践、“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众所周知,改变世界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实践哲学的重要指向,然而,“如果你想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至少是确保它不至于盲目地走向它自身的毁灭,那你就必须理解这个世界的本性”<sup>[14]</sup>。显然,阐释“自在自然”的性质是“理解世界的本性”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依照唯物史观,“人们并不是在自在自然之外创造人化自然,而是在自在自然所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建造人化自然的”<sup>[15]</sup>。因此,从实践出发理解“人化自然”,并不是否认“自在自然”的客观存在,作为人的实践作品的自然界在本质上仍然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因此,可以说,承认“自在自然”的客观存在是从实践出发理解“人化自然”的必要前提。

由上可知,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具有从实践的立场出发理解自然的根本思路,并且,晚年恩格斯揭示自然界从“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过渡以及“自在自然”的性质等内容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补充和完善。比利时学者伊·普里戈金与法国学者伊·斯唐热对此表示赞同,他们指出:“自然史的思想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完整部分,是马克思所断言,并由恩格斯所详细论述过的。”<sup>[16]</sup>

## 二、从实践出发理解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自然的立场出发理解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以德雷帕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者就是其中的重要一支,他们单方面强调自然对人的作用,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sup>[8](483)</sup>,进而把人的现实问题严格地限制在关于自然界的讨论范畴之内。

对此，恩格斯批评他们忽视了更重要的一点，即“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sup>[8](483-484)</sup>。

当然，承认人反作用于自然界也并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的立场。在哲学史上，唯心主义者同样肯定了这一点，不过这种肯定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精神层次上”<sup>[17]</sup>，并不涉及实践活动本身。譬如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指出：“自然是作为他在<sup>②</sup>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sup>[18]</sup>显然，“黑格尔把自然界视作绝对精神或绝对理性的产物”<sup>[19]</sup>。照此逻辑，人对自然的反作用也就表现为精神或理念力量的运动。

不同于唯心主义者，恩格斯认为，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是通过以“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sup>[8](558)</sup>实现的。从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中我们都能发现，“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sup>[8](484)</sup>。不难看出，恩格斯已经认识到现实的自然界是不断生成着的自然界，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进化和发展，而这背后的推力并不在于纯粹的精神动力，而在于现实的物质力量，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依照恩格斯的观点，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对自然反作用最基础、最根本的表现。恩格斯认为，在生活资料上，“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sup>[8](548)</sup>。恩格斯在这里延续了《形态》中的观点，即“从‘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到‘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历史性行动”<sup>[20]</sup>。在恩格斯看来，尽管物质资料是人与动物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东西，但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只能被动地接受自然界的作用，只能获取自然界现成的物质生活资料，这就导致动物“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sup>[8](421)</sup>。相反，人则不同。人不仅能够直接地获取生活资料，还能够主动地“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sup>[8](548)</sup>。这些生活资料不仅包括动物、植物等的原始面貌，还包括“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变得再也认不出它们本来的样子”<sup>[8](558)</sup>的物品。因此，只要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不停止，人类对自然的反作用将持续存在。

其二，现实条件的创造行为是人对自然反作用的直接表现。恩格斯认为，目前人类的现实生活条件大部分已经不是自然界现成提供的，而是由人通过实践活动的“历史的发展造成的”<sup>[8](408)</sup>。换句话说，人的创造行为让自然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物质形态和新的自然过程”<sup>[21](175)</sup>。恩格斯强调，只要我们能够洞悉自然界中某种运动发生所需要的客观条件，我们就能模拟环境、创造条件引发这种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sup>[8](482)</sup>。以工业为例，在恩格斯看来，纯粹的自然界绝不能产生出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现实条件，它们只能由人类创造。在今天，现实条件下的创造行为更能为我们所感知。人类创造了越来越多自然界中不曾有过的现实条件，包括人工自然物、人工自然体，“以及人们克隆的各种动物、组织和器官等等”<sup>[21](176)</sup>。德国自然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曾指出，人们通过“收集自然现象之间的全部个别的实际关系，把它们并置，力图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在此基础上以或多或少的确定性从一个现象可以预言另一个现象”<sup>[22]</sup>。与奥斯特瓦尔德的观点相比，恩格斯则进一步阐明，人们从已有自然现象中预言的另一个现象将借由实践变成现实。

其三，劳动工具的制造与使用是人对自然反作用的重要表现。恩格斯强调：“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sup>[8](421)</sup>依照恩格斯的逻辑，人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工具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人对自然的反作用也就体现到多大程度。在当时，蒸汽机“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sup>[8](421)</sup>。蒸汽机对各种纯人力劳动的全面代替，表明人对自然的反作用越来越大。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曾指出，机器大生产让“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sup>[23](356)</sup>，风、水、蒸汽等自然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被纳入生产活动之中。而在此前的社会中，“人类劳动只不过表现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sup>[23](356)</sup>。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标志着人对自然力更强大的征服和利用。

然而, 恩格斯关于人对自然反作用的阐释被西方“马克思学”代表诺曼·莱文视为非实践的立场。莱文的理由在于: 恩格斯在对待自然上, “关心控制而不关心渗透。他对非转化的东西的态度是浮士德式的(Faustian), 即拼命想去操纵它。但是, 从操控和支配的角度去对待自然, 乃是设定非转化东西的首要性。这正是实践的哲学所否认的”<sup>[11](154)</sup>。诚然, 恩格斯的确使用过“支配”“控制”等词语, 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征服关系。美国学者福斯特就曾指出: “‘支配自然’的观念, 虽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但并不必然是指对自然或自然规律的极端漠视。”<sup>[24]</sup>恩格斯便是如此主张的。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 恩格斯多次强调, 人类实践需要遵守自然规律, 从人的实践活动与自然规律的关系中理解人与自然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恩格斯认为, 在人类通过实践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并不意味着人类活动完全突破自然界的束缚, 人类的实践活动仍然需要遵守客观的自然规律。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 人类实现了对自然界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恩格斯发出提醒: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sup>[8](559-560)</sup>以阿尔卑斯山为例, 当时的意大利人将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 这既破坏了高山畜牧业, 导致大部分山泉枯竭, 又造成了雨季的洪灾泛滥以及水土流失。恩格斯强调, 我们对自然的支配作用并不在于肆无忌惮地利用自然资源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而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sup>[8](560)</sup>, 能够认识“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sup>[8](560)</sup>。恩格斯已经认识到, 自然界中的运动和变化必定服从于其内在的运行规律, 这些规律也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们正是在实践与自然规律的平衡中找到与自然界相处的和谐状态。

由上可知, 恩格斯既从客体自然的角度理解人, 又从人的角度理解自然界的客观性, 进而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石的自然与人相统一的辩证观点。这一点与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致的。

### 三、从实践出发揭示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

相对于马克思来说, 对自然科学的关注是恩格斯理论发展的一个侧重点, 但恩格斯从来没有脱离实践去理解自然科学, 他始终是以实践为基础探索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

其一, 自然科学的发展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青年恩格斯就已经认识到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人类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等文本中, 恩格斯指出, 人类在进入18世纪后“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sup>[6](88)</sup>。此前关于自然界“分门别类的研究的界限被不断打破”<sup>[25]</sup>, 彼此有了因果联系, 逐渐变成了系统的科学理论。恩格斯意识到, 自然科学并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的, 在当时, “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sup>③[6](97)</sup>。而以自然科学发展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在英国拉开序幕, 主要是因为相对于德国注重哲学思辨、法国注重政治革命来说, 英国更加注重社会实践活动。恩格斯强调: “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sup>[6](97)</sup>随后, 在《形态》中,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同批判了费尔巴哈直观的自然科学观。费尔巴哈看到了机器发明、技术更新依赖于纯粹自然科学的发展, 但是他并没有看到“‘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sup>[6](529)</sup>等人类的感性活动才得以发展。这些活动一旦中断, 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会止步不前, 已有的自然科学成果也将消失殆尽。

晚年的恩格斯进一步直接阐明了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自然辩证法》中, 恩格斯强调, 不胜枚举的事实告诉我们“科学应归功于生产”<sup>[8](428)</sup>。从早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

看，“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sup>[8](427)</sup>。恩格斯指出，种植活动和放牧活动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它们依赖季节变化，因此需要学习天文学知识；而天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数学，因而数学也随之发展起来；后来，灌溉和建造活动相继出现，力学又应运而生。因此，早期自然科学是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英国自然科学家斯蒂芬·F.梅森在梳理早期世界自然科学发展历史的过程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譬如，在分析埃及最早的医学文献时，梅森就指出：“埃及人从制作木乃伊的实践中一定具备一些解剖学知识。”<sup>[26]</sup>可见，人类早期对天文学、数学、力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探索，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具体谈到中世纪以来的社会历史时也强调，科学在中世纪之后以难以预料的速度发展起来，我们要“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sup>[8](427)</sup>。在恩格斯看来，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其根本原因既不是纯粹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不是唯心主义者所阐释的出自自然科学家探索自然奥秘的主观动机，而是人类生产实践的需要。中世纪以来，工业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世界地理大发现等，“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而完成的”<sup>[8](428)</sup>实践活动客观上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可见，在恩格斯的视域中，脱离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自然科学就不能形成与发展。

其二，自然科学的发展目的在于服务人的实践活动。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纯粹的科学理性目的，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人的实践活动服务。

一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提高了人的实践能力。这一观点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得到显著体现。一方面，自然科学减轻了人类必要劳动的时长和强度。恩格斯指出，当自然科学原理运用到生产机器与机器生产中时，工具会更新、分工会更完善更细致，进而帮助人类“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劳动”<sup>[6](399)</sup>。由此会缩短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人的自由活动时间。同时，在那些不能节省的必要劳动方面，许多“真正的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sup>[27](423)</sup>，人也将有更多的精力与体力进行自由活动。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推动人类实践活动向更广的范围和更深层次发展。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科学快速发展之前，人们总体上“过着平静的、不动脑筋的庸碌生活”<sup>[6](392)</sup>，整个生产活动基本围绕着农业展开，而且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之后，人们的工业领域被历史性地打开，并且，由自然科学原理与机器结合所产生的推动力瞬间“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sup>[6](398)</sup>，英国的纺织业、金属开采业、机器制造业、交通业等全面开花。同时，恩格斯还指出，在化学、力学等“科学的进步”<sup>[6](400)</sup>下，传统的农业也发生了变革。人们按照温度和气候变化实行轮作制，拆除不必要的篱笆围栏，使用新式农具翻新土地、排干积水、施加化肥等。总之，在英国的农业、工业等方面，到处都体现着自然科学的应用价值。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活动中，自然科学却呈现出“异化”现象。作为展现人类力量、为人类实践服务的自然科学(包括由自然科学发展带来的机器)却直接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对工人只能产生不利的并且经常是很严重的后果”<sup>[27](425)</sup>。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sup>[28]</sup>恩格斯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制度帮助“个别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sup>[27](421)</sup>，使得本该属于全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然科学成果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资产阶级却故意回避这一问题，并将这种“特殊利益说成是真正的民族利益”<sup>[6](403)</sup>，殊不知无产阶级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享受到自然科学带来的福利。相反，“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sup>[25](421)</sup>。在恩格斯看来，只有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制度下，自然科学发展带来的机械改进才能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真正认可与接纳。

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推进了人的自由解放运动。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力学和物理学促进了蒸汽机的诞生。蒸汽机的出现为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

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sup>[8](121)</sup>，即“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sup>[8](121)</sup>的社会状态。马克思在《手稿》中也曾提及：“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sup>[6](193)</sup>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尽管造成了工人“非人化”的极点，但自然科学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将为人的发展服务，最终将会推动人的自由解放活动的进程。

由上可知，在恩格斯的视域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不是纯粹的科学运动，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的。自然科学产生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最终也服务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恩格斯从实践出发揭示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也得到德国学者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的赞同。在分析《自然辩证法》后，格姆科夫指出：“恩格斯用自然科学史中无数的事实，证明：自然科学的发展，归根结蒂是以实际的需要，即生产的需要为条件的。”<sup>[29]</sup>在格姆科夫看来，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发展源自人类的实践需要，其发展最终也将满足人类的实践需要。

#### 四、从实践出发阐释人从“自然猿”到“社会人”的转化

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了劳动是人类从自然界的猿猴转向社会的人的决定性因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内涵<sup>[30]</sup>。

人类的起源问题是宗教神学和自然科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中世纪，这一问题始终被神学主导着。神学家极力将人类起源问题神秘化，宣扬上帝是万事万物(包括人)的创造者。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人猿同祖”的观点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将人们对人类起源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赫胥黎从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等方面入手，提出了“人猿同祖”的观点，即人类和猿类是由同一祖先分化而来的。达尔文则更进一步，在《人类的起源和性选择》中指出人类源于自然界，是古代的类人猿一步一步进化而来的。相对于神学的“上帝造人说”，赫胥黎和达尔文的解释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论证了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自然选择、自然生成。但是，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和历史条件等，他们没能完全超越生物学的范畴去解释猿是怎样演变为人的，包括后来的达尔文学派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不能提出明确的看法……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sup>[8](558)</sup>。因此，在批判借鉴达尔文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sup>[8](550)</sup>的命题，科学解释了劳动在“自然猿”向“社会人”转变中的关键作用。

第一个阶段是直立行走能力的形成。古类人猿的直立行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初只是偶然，后来才渐渐成为必然。这是由于气候变化及森林缩小等生活环境不断改变，迫使古类人猿不得不到地面上活动，使得它们的手和脚本来就有的分工更加明确和专门化：脚逐渐发展了行走和支撑身体的功能，手解放出来并逐渐发展了抓和握的功能。这是人类从猿进化到人的第一步。手的解放，使得类人猿从只能使用天然工具进行动物式的本能活动向从事制造工具这一人类特有的劳动形式的发展成为可能。

第二个阶段是手的活动的加强。在劳动中，由于手经常和新的工具相适应，不断获得新的机能和构造，就越来越灵巧。恩格斯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sup>[8](552)</sup>当类人猿在某一个时期制造出第一批最简单的工具时，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手和劳动，它们也由此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是从猿到人的过程中第一次质的飞跃。同时，根据生长相关律<sup>④</sup>，人的直立行走与手的不断解放推动了身体其他各部位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发展起来了，“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sup>[8](553)</sup>。于是，作为交流载体的语言便在劳动中产生了。

第三个阶段是脑髓的形成。在劳动过程中，客观外界的特性、属性不断刺激着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的感觉器官和大脑，使他们大脑中的各种感觉、印象不断增多、加深。与此同时，已经产生的语言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了语言，人可以借助词来概括事物的属性和本质，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产生抽象思维。恩格斯指出，随着劳动的继续深入，“脑和为它服务的器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sup>[8](554)</sup>。在这种推动力的作用下，人与猿的差距越来越大，并使这种差距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第四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形成。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发展，“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sup>[8](557)</sup>层出不穷。受此影响，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也逐渐由简单到复杂地发展起来。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产生了民族和国家，产生了宗教和哲学等意识形态。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的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手、人脑、意识、社会关系是人类形成的重要标志，而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在劳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毫无疑问，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实践即劳动发展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我们“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sup>[5](313)</sup>。

由上可知，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比达尔文等人的解释更加具有科学性、社会性和完整性。它不仅对人类起源的问题进行了自然科学的分析，还将这一问题从自然科学上升到自然哲学的讨论范畴，突出了实践活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曾在《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中指出，如果说达尔文的功劳在于把人从神学视域中解放出来并视为动物界的一部分，那么毫无疑问，进一步“把人类从动物界中区别出来，使人看清了人作为劳动者，作为自然的改造者、自然的征服者的特殊本质”<sup>[31](11)</sup>则是恩格斯的重要贡献。并且，自恩格斯提出这一理论以来，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愈来愈丰富，完全证明了恩格斯的科学论断”<sup>[31](67)</sup>。

## 五、结语

综上所述，恩格斯的自然观依旧是立足于人类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分析恩格斯思想发展历程也会发现，恩格斯并不是从自然唯物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是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开始转向的，这个过程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他与马克思一道发现了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sup>[6](525)</sup>。《形态》一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它集中展现了恩格斯“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sup>[8](13)</sup>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在人类实践的立场上完成的。因此，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观上存在差异的话，至多是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是立场的根本对立。同时，恩格斯通过实践的视角，深化了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考、对自然科学发展历史的理解、对人类从“猿”到“人”演化过程的认识，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内涵。

事实上，在恩格斯自然观是否离开“实践”的问题上，卢卡奇是具有话语权的代表人物。尽管他在青年时期批判恩格斯直观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但是卢卡奇晚年进行了修正，恢复了恩格斯自然观的声誉。遗憾的是，卢卡奇晚年的观点并未引起西方学界足够的重视，后起的西方“马克思学”仍然沿着早期卢卡奇的批判路线一走到底。他们紧紧抓住恩格斯某一时期文本中的某一观点，忽视了恩格斯阐释的具体语境以及其前后文本的逻辑关系，进而制造其与马克思思想的全面对立，使人们误信“‘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已变为一个至多令人迷惑的口号”<sup>[32]</sup>。因此，我们必须回归文本，澄清恩

格斯自然观中的实践本体, 厘清他对马克思自然观的重要贡献, 更好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 注释:

- ① 先在性指自然界是先于人类存在的,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独立性指无论有没有人以及人的意志参与, 自然界都始终处于运动与变化之中。
- ② 根据文本语境, 这里的“他”指上帝。
- ③ 根据文本语境, 这里的“社会革命”指工业革命。
- ④ 生长相关律指的是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在生长过程中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息息相关。

### 参考文献:

- [1] 吴家华, 任瞻, 侯衍社.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2] LICHTHEIM G. Marxism: Anhistorical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250.
- [3]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下[M]. 荣震华, 王太庆, 刘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A.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欧力同, 吴仲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9] 马拥军. 评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三大误解[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12): 96–101.
- [10] 马拥军. 恩格斯自然观的实践唯物主义性质及其当代意义[J]. 理论探讨, 2020(4): 69–76.
- [11] 莱文. 辩证法内部对话[M]. 张翼星, 黄振定, 邹濂, 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12] 孙伯鍊, 张一兵. 走进马克思[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140.
- [13] 阎孟伟.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若干被忽视的理论问题[J].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2023(4): 50–61.
- [14] E.拉兹洛. 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M]. 闵家胤,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
- [15] 杨耕. 重建中的反思: 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31–32.
- [16] 普里戈金, 斯唐热. 从混沌到有序: 人与自然的新对话[M]. 曾庆宏, 沈小峰,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52.
- [17] 俞吾金. 重新理解马克思: 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203.
- [18] 黑格尔. 自然哲学[M]. 梁志学, 薛华, 钱广华,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9.
- [19] 刘顺. “科学的辩证法”之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超越[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129–138.
- [20] 王洪波.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历史观中社会关系规定的文本面向及当代审思: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典论述为依据 [J]. 教学与研究, 2024(7): 47–54.
- [21] 陈其荣. 自然哲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22] F.W.奥斯特瓦尔德. 自然哲学概论[M]. 李醒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3.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4] 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 肖峰,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14.
- [25] 苏振源. 恩格斯传承德国哲学的经验与启示: 基于文化现代化的视角[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25–34.
- [26] 斯蒂芬·F.梅森. 自然科学史[M]. 周熙良, 全增嘏, 傅季重,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12.
-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80.
- [29] 格姆科夫. 恩格斯传[M]. 易廷镇, 侯焕良,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389.
- [30] 张严. “劳动创造人本身”命题的再考察: 重读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J]. 理论视野, 2020(12): 69–74.

- [31] 吴汝康. 人类的起源和发展[M].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65.  
[32] 吕贝尔. 吕贝尔马克思学文萃[M]. 郑吉伟,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5.

## Has Engels' view of nature departed from “practice”? —Re-examination based on Engels' classic texts in his later years

WANG Hongbo, CHENG Yulin

(College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Whether Engels' view of nature deviates from “practic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of debate in academia. Based on Engels' classic texts in his later years, it is confirmed that human practical activities are the logical basis of Engels' view of natur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all starting from “practice”: first in reveal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atural freedom” to “humanized nature,” and clarifying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such three as practice, “natural freedom”, and “humanized nature”, second in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forming a dialectical view of the unity of humans and nature, third in reveal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from practice and consolidat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foundation of natural science, and finally in interpreting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beings from “natural apes” to “social humans”, as well as scientifically explaining the decisive role of labor in the origin of humanity. Hence, it can be known that Engels' view of nature is still based on human practical activities, not only maintaining consistency with Marx in principle, but also enriching Marxist view of nature in terms of content.

**Key words:** Engels; practice; view of nature; production; labor

[编辑: 胡兴华]